

“多余人”的后代或变体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五大思想小说中西方派形象所体现的

根基主义思想

万海松

摘要：陀思妥耶夫斯基五大思想小说中的人物，即《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白痴》中的伊波利特、《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少年》中的维尔希洛夫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凡·卡拉马佐夫，都属于以普希金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同名主人公为前辈的“多余人”的后代或变体。这类“多余人”形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大多以激进的西方派面貌出现。奥涅金之类的“多余人”知识分子对真理和行动的渴望，以及他们经历憧憬与困惑却最终一事无成，其言行甚至危及传统与根基等典型的表面特征，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一类年轻的西方派形象所继承，但他们最主要的、共同的精神特征是：受到欧洲资本主义文明和西方理性主义思潮的诱惑，脱离了本民族的文化土壤，在自己的祖国成为不仅无所事事、反而有损于俄国传统和文化根基之人，沦为思想上的漂泊者和人民的疏离者。对这类作为西方派的“多余人”形象爱恨交加的复杂情感，亦体现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根基主义立场。

关键词：陀思妥耶夫斯基；五大思想小说；“多余人”形象；根基主义思想

[中图分类号] I512.064

DOI: 10.12002/j.bisu.1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539 (2017) 03-0072-12

引言

自从 18 世纪俄国文学崛起以来，几个具有社会思想史意义的书名式提问一直是其不可回避的主题，这就是“谁之罪？”“怎么办？”“谁在俄罗斯过得好？”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继承了俄国文学中“小人物”和“多余人”等题材，并开创性地回答了上述问题。这其中，他的五部思想性长篇小说（《罪与罚》《白痴》《群魔》《少年》《卡拉马佐夫兄弟》）更是大力开拓了“多余人”群像的广度与深度。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正教与俄罗斯文学研究”（项目编号：15ZDB092）的阶段性成果。

这五大思想小说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其一是描写作为西方派的“多余人”后代或者变体，这些出生在俄国的知识分子精英，是曾被人民寄予厚望却最终让人民无比失望的典型，作家对他们既爱又恨，重点批判他们后天所受的外来思想；其二是塑造俄国未来一代的形象，通过描绘他们早年经历中非凡的人生迷误，最终把他们树为正面的典型，塑造为俄国人民和俄罗斯文化希望的化身。正是在这一贬和一褒之间，凸显出作家本人的根基主义立场。

本文所指的五大思想小说，其分类依据主要来自于别尔嘉耶夫的一个说法，但又并非完全遵循他的解释。别尔嘉耶夫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分为两个时期，即《地下室手记》之前和之后：“在这两个时期之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生了精神上的根本变化，在这个变化之后关于人的某种新的东西给他以启示。从此以后才开始真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即《罪与罚》《白痴》《群魔》《少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作者。”（Бердяев，2002：353）别尔嘉耶夫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两个时期分别叫做旧人道主义时期和新人道主义时期，并认为在前一时期作家“继承了俄罗斯文学中的人道主义，对所有不幸之人、受委屈之人和堕落之人的俄国式同情，对人的心灵之价值的俄国式感受”，而自《地下室手记》开始，作家就“成为旧人道主义的敌人，成为人道主义乌托邦和幻想的揭露者。……他克服了旧人道主义天真、简单的因素，一种全新的、悲剧的人道主义给他以启示。”（Бердяев，2002：354）别尔嘉耶夫以新旧人道主义的标准划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时期，其理由值得商榷，仅就这五大思想小说而言，笔者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关注的重点开始侧重于理性（功利化的工具理性）和天性（以信仰为主要载体的价值理性）之争，批判的锋芒集中瞄准唯理性主义或理性至上主义，他的人道主义激情依然贯彻着人文关怀的亲切感和宗教探索的指向性。

—

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一类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多余人”（лишний человек）一词最早出现在屠格涅夫1850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多余人日记》中，是主人公丘尔卡图林的自称。后来赫尔岑在《往事与沉思》中借用该词来评价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同名主人公，此后这一称谓就被俄罗斯学界广泛采用，用来指代跟奥涅金相类似的人物形象，比如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格里鲍耶多夫《智慧的痛苦》中的恰茨基、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中的奥勃洛摩夫、赫尔岑《谁之罪？》中的

别尔托夫等，并追认奥涅金为“多余人”的鼻祖。“多余人”多系出身高贵的青年知识分子，前途广阔却鄙视做官，因无法实现自我价值而无所事事，甚至在决斗、恶作剧等琐事中虚度年华，因而在祖国的环境里（一般被贵族阶层）被视为异己。俄国文艺学家尤里·曼认为，“多余人”的典型特征是“精神上倦怠、深刻的怀疑主义、言行不一，而且还是社会的消极面”（Манн，1987：204）。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多余人”概念的阐释，多见于他对普希金笔下的主人公奥涅金的解释和引申。在1866年之前的作品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多次论及奥涅金所代表的一类人的形象特征和形成原因，比如，在发表于1861年的“关于俄国文学的系列文章”（共5篇）中，就有对奥涅金之类的人物的集中思考。尽管在这些作品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直接把奥涅金之类叫作“多余人”，但其论述与学术界对“多余人”特征的界定是基本一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认为，奥涅金是在无意中（即非主观）成为无所事事、苦闷彷徨的贵族知识分子的。后来，又把奥涅金之类的人物称作祖国大地上“不幸的漂泊者”：“这种漂泊者是我们这个脱离人民的社会中历史注定必然要出现的历史性的俄罗斯受难者。”（陀思妥耶夫斯基，2009：980）在笔者看来，像奥涅金之类的“漂泊者”其实就是“多余人”。经过俄国文学画廊的传承，“多余人”形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又得到繁衍和延续，已经拥有了众多后代或者变体。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这些“多余人”后代或变体，具有共同的最主要的外在和精神特征：他们都受到欧洲资本主义文明和西方理性主义思潮的诱惑，脱离了本民族的文化土壤，成了在自己的祖国不仅无所事事、而且有损于祖国利益的人，沦为思想上的漂泊者。由此我们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五大思想小说中的人物，即《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白痴》中的伊波利特、《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少年》中的维尔希洛夫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凡·卡拉马佐夫都是程度不等的“多余人”的变体。小说中的这类“多余人”的变体或后代均以十分激进的西方派面貌出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基主义立场也体现在对这类“多余人”爱恨交加的复杂情感之中。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奥涅金是一个时代的产儿，即俄国欧化改革时代的产儿。他认为，奥涅金这类“历史的典型”身上典型的犹豫和游荡特征，象征了俄国在欧洲式道路面前的犹豫不决：“在他身上，鲜明地体现了一个俄国人在他一生的著名时期所能够体现的全部特征，——正是在这个时期，我们第一次感觉到了文明对于我们如同生命，而并非像一件精致的装饰品，与此同时，所有的疑惑，所有奇怪的、并非按照当时的方式解决的问题，第一次从四面八

方开始包围俄国社会并闯进它的意识之中。”(Достоевский, 1979: 10)奥涅金之流,一方面对当时的欧洲道路和未来的俄国道路怀着好奇的憧憬,另一方面,心中具有强烈的俄国情结,身上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于是,奥涅金们“第一次真正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俄国人,并且亲身感受到,要割断与故土的联系、呼吸外国的空气是多么困难”(Достоевский, 1979: 10)。以奥涅金为代表的俄国贵族知识分子,无法割舍自己的爱国主义情结,在认识到俄国也具有与欧洲不同的独特性之后,转而开始怀疑起了欧洲的道路。于是,奥涅金们就产生了疑虑和犹豫:到底是选择欧洲,还是俄国?“在奥涅金身上,俄国人第一次痛苦地意识到或者至少是开始感觉到他在人世间无事可做。他是欧洲人:他将为欧洲带来什么?欧洲是否还需要他?他是俄国人:他将为俄国做什么?他还理解俄国吗?”(Достоевский, 1979: 11)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这种疑虑是奥涅金之流的俄国贵族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使然。“奥涅金这一典型恰恰就应该首先在所谓的俄国上流社会形成,这个社会脱离根基最为严重,它表面的文明已经发展到最高程度。”(Достоевский, 1979: 11)然而,在俄国的现实中,奥涅金们找不到现成的答案,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无法确定自己的信仰,所以只能痛苦、徘徊。为了俄国,他们执着地探寻答案,其动机是无私的,其心灵是高尚的。“要是他能成为一个真正自私的人,他也就平静了”(Достоевский, 1979: 12)。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奥涅金虽然是俄国特定历史阶段(彼得大帝改革时期)的一个知识分子典型,但是,他已经化身为俄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绵绵不绝的精神,贯穿于整个俄国历史。“这个典型终于进入了我国整个社会的意识,并且开始随着一代代的新人而演变和发展。”(Достоевский, 1979: 12)陀思妥耶夫斯基举例说,这个典型发展到莱蒙托夫的毕巧林那里,已经到了“难以遏制的愤世嫉俗的地步,到了将两种不同的因素——几近自我崇拜的自私和愤世嫉俗的自暴自弃——以相当正宗的俄罗斯方式奇妙对立的地步”(Достоевский, 1979: 12)。由此可见,奥涅金之类的“多余人”知识分子对真理和行动的渴望,以及他们最终沦落到无事可做、一事无成等外在的典型特征,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一些年轻的西方派形象所继承。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五大思想小说中,具有奥涅金之流的“多余人”特征的人物,基本上都是“俄国的欧洲人”形象。他们跟奥涅金一样都是年轻人,具有无限的精力和创造力,却将青春浪费在思想实验上。他们曾经怀着美好的愿望想干一番事业,但不幸被那些跟俄国东正教文化格格不入的异己思想所诱惑,堕落进并深陷于理性主义的泥潭,成为程度不同的无神论者,并因此体会到了理性主义的缺陷与不足,首鼠两端,于是开始在理性和信仰、欧洲与俄国

之间徘徊，成了思想上的流浪者、脱离俄国根基却在故土漂泊的“多余人”。他们辜负了亲人和人民的期望，或在思想上犯了罪，或在实际行为中做出了损害祖国利益的事情，因为这些异己思想，他们付出了失去青春、自由乃至生命的代价，但是他们依然不肯主动回归俄国的根基，或者说身不由己、无法结束漂泊。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奥涅金的怀疑主义从一开始便带有某种悲剧成分，并且有时还具有刻薄讽刺的意味。”（Достоевский，1979：11）

二

《罪与罚》中的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为了拯救因贫困而即将遭受不幸的母亲和妹妹，渴望成为法国皇帝拿破仑这样的权贵和德国银行家罗思柴尔德那样的富商，他不由自主地接受了盛行于欧洲的个人主义和虚无主义思想，认同英雄造世说和英雄无罪论，并亲自践行这些理论，残忍地杀害了被他认为是社会蛀虫的放高利贷的老太婆。“我想成为拿破仑，所以才杀人。”（陀思妥耶夫斯基，1982：513）他所发表的文章的主要内容就是宣扬拿破仑主义：“全部的问题在于，在他的文章里，所有的人不知为什么都被分成‘平凡的’和‘不平凡的’两类。平凡的人必须俯首帖耳地过日子，没有犯法的权利，因为——您知道——他们是平凡的人。可是，不平凡的人，正因为他们是不平凡的，所以有权犯各种各样的罪，有权肆意犯法。”（陀思妥耶夫斯基，1982：319）在作家看来，这种理论虽然具有底层人物不满现状的反抗精神，但归根结底属于“环境决定论”的余孽，从口号到实质都不符合俄国本土的东正教文化精神，明显是来自西方的异己思想，因为它强调“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法则，公然践踏社会道德伦理的底线，悍然蔑视他人的生命权。在杀了人、对大地母亲犯了罪之后，作为一个来自俄国大地的贫苦人，拉斯柯尔尼科夫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几乎窒息心灵的道德谴责，可与此同时，他仍不甘心就此放弃拿破仑主义，在罪与罚的心理斗争中苦苦挣扎；只有再度接近了人民，特别是认识索尼娅，这个象征着既有包容精神又有净化能力的俄国人民的形象（如同《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塔吉扬娜），听从福音书的召唤之后，拉斯柯尔尼科夫才得以通过劳动和苦役，最终获得心灵的解脱和道德上的新生。拉斯柯尔尼科夫代表了19世纪60年代青年一代的俄国平民知识分子，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五大思想小说中第一个奥涅金式的“多余人”形象。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漂泊表明俄国大地上无神论等思潮的泛滥以及俄国东正教精神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他的回归又寄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国人民和东正教精神力量的信心。

《白痴》中的少年伊波利特曾参与一帮少年对梅什金公爵实施的讹诈，这些少年实践着虚无主义思想，把敲诈勒索等为道德所谴责的行径看作“因高尚的绝望铤而走险”“否定”或者“鬼知道叫什么东西”。而伊波利特本人虽然一度热衷于虚无主义少年的集体行动，但在思想上常常动摇于虚无主义和有神论之间。因为其自幼患病，起初，他坚决否定任何的亲情和怜悯，苛责自己可怜的母亲，俨然是家里的小暴君，后来，他在《我的必要说明》里，表示自己十分赞同一个老军医对囚犯们的无私关怀，不久，又企图用自杀来向大家宣布自己拥有自由意志。他刚刚有了助人为乐的成就感，旋即就被罗戈仁家中那幅描绘基督被钉十字架场面的油画吓傻了眼。他的几次动摇，与奥涅金在欧洲和俄国之间的彷徨非常相似，表明这个年轻的平民知识分子在人道主义和功利主义之间莫衷一是。这个为思想所累的少年形象，既折射出他所处的是一个异己思潮层出不穷的时代，又反映出青少年是最易受外来的激进思想影响，也是最容易沦落为在俄国大地上漂泊的“多余人”的一个群体。

斯塔夫罗金是小说《群魔》的思想主轴，是小说中所有人的思想的来源，他周围的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践行他的思想。他参加过美国西部的劳动实验，曾经有过与沙托夫同样的革命理想，还成为彼得·维尔霍文斯基五人小组的思想领袖。正如尼古拉·别尔嘉耶夫所指出的，斯塔夫罗金身上承载了太多的愿望和使命，小说中的所有其他人物，几乎都是从斯塔夫罗金的精神里走出来的：“斯塔夫罗金是有创造性的，（几乎）是一个天才人物。全部最终的和极端的思想都在他身上产生：俄罗斯民族即上帝代言人的思想，人神的思想，社会革命和人类蚂蚁窝的思想。伟大的思想来自于他，产生了其他人，过渡到其他人身上。”（Бердяев, 1996: 519~520）但是，斯塔夫罗金因为无所事事而一度沉迷于追求感官刺激。他本质上渴望有所成就，实际上却不知道能在哪些领域有所建树。他的迷茫与空虚导致他常常向世俗伦理发起挑战，以至于沙托夫竟当众扇他的耳光，叫他去劳动，意思是让他主动接近大地和人民。虽然斯塔夫罗金也曾想通过各种方式回归俄罗斯大地，但他在俄国的所作所为根本不为本国人所容，以至他被迫避走国外。像瑞士乌里州这样的地方，竟成为他迫不得已的栖身之处。然而，侨居国外实在有悖于他的心愿。最后，为了偿还自己有意无意对人民犯下的罪孽，他在俄国家中的阁楼上自我了结。作为“俄国的欧洲人”，斯塔夫罗金宁愿死于故土也不愿苟活于异乡的结局，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给这类新的“多余人”所指出的一条不归路。斯塔夫罗金沦为“多余人”的原因，是缺乏最起码的伦理道德，更不用说宗教信仰。

至于《少年》中的地主维尔希洛夫，更像是一个精神上已经矮化、永恒的

西方主义者。他在年轻时因迷恋描写农奴的人道主义小说，如《波琳卡·萨克斯》和《苦命人安东》，而与农奴姑娘索菲娅发生了私情。这反映出理想主义盛行年代里知识分子的典型状态：知识分子的创造力无处发挥或者不知道如何发挥，竟然把满足个人私欲与实现时代的人道主义理想混为一谈。壮年时期的维尔希洛夫又迷恋于所谓的“日内瓦思想”，即卢梭提出的民主和平等的思想：“日内瓦思想是一种与基督无关的美德，我的朋友，是现代的思想，或者不如说是一切现代文明的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1993：268）由于“日内瓦思想”的无神论倾向，他自然而然地轻视基督式的爱：“爱自己亲近的人而不轻视他是不可能的。”（同上：271）他接受外来思想，参与欧洲革命等事实表明，他认同并追逐这些言论和事件的深刻的无神论本质，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目中无神论就是与俄国文化格格不入的异己思想。而且，在维尔希洛夫身上，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他虽然经常追逐外来的思想，但实际上根本不能长久地相信一个思想，他在信仰上常会发生动摇。对此，他自己有清醒的认识：“要是我真把我所信仰的思想讲透，结果几乎总是这样：讲到末尾，我自己不再相信我讲的东西。”（同上：277）他能把自己年轻时的理想说得头头是道，可是他从未与崇尚自然和天性的朝圣者马卡尔辩论过，因为他深知马卡尔的行为明显是对他言行举止的默然有力的否定。尽管马卡尔的去世卸除了他的道义负担，但他仍然出现了思想和人格的分裂。他凄惨的晚年境况，既说明不管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他都一事无成，还表明他是一个永恒的西方主义者，沦为一味追逐欧洲新潮思想的附庸风雅者，所以他在欧洲、在俄国都属于真正的“多余人”——谁也不需要的人。在作家笔下，骨子里蔑视最基本的人间之爱，蔑视东正教，是导致维尔希洛夫永远漂泊、无法回归俄国根基的主要原因。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凡·卡拉马佐夫一直为脚踩无神论和有神论这两条船而苦恼不已。在修道院的聚会中，在坚持教会独立论的神父们面前，他大胆地谈论自己十分赞同的国家教会化理论，以别出心裁的见解挑战宗教权威，同时也是在挑战俄国的世俗和国情。他声明：“我直接而且简单地承认上帝。但是应该注意到这一点：假如上帝存在，而且的确是创造了大地，那么我们完全知道，他也是按照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创造大地和只是有三度空间概念的人类头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1981：351）他与魔鬼之间展开的关于信仰和理性的争论，其实不过是内心分裂的体现，他本身就在信仰和理性之间苦苦挣扎。确实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从柏拉图到康德的理性哲学的许多世纪的发展在伊凡身上结束……‘人是理性的存在物’——这个公理进入到他的血肉之中。伊凡为自己的理性而骄傲，他更容易拒绝上帝的世界，而不是理性。假如世界

不能用理性来证明,那么就不能接受它。理性主义者不愿意向某种‘胡说’妥协。悲剧就在这里开始:理性的意识在世界秩序里找不到任何意义。在世界里有非理性的原则,有恶和痛苦,它们是理性所无法理解的。”(Мочульский, 1947: 505~506,着重号原文如此)然而,他的痛苦彷徨早被智慧的俄国人看出。在修道室的时候,佐西马长老就已经一眼看穿了他的内心痛苦:“假使不能作肯定解决,那么同样也永远不会作否定的解决,您是自己知道您的心的特点的,而您的心灵的全部痛苦也就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1981: 94~95)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伊凡越来越觉得无力反驳理性至上主义,发生在俄国的很多关于家庭暴力的新闻使他对倡导基督式的爱的观点产生了深刻的质疑,然而,要彻底抛弃基督教,全面拥抱标榜理性和功利的西方思想,他又确实做不到。因此,在俄国的土地上,伊凡这些为此类无神论思想而纠结的“俄国的欧洲人”,只会永远水土不服、结局悲惨。“从历史观点看,伊凡的思想必然会在康德的逻辑上的二律背反和道德上的诡辩术世界里迷失方向。”(弗里德连杰尔,1994: 355~356)只要对信仰存在质疑,伊凡们就不会无条件地拥抱理性,只要理性还有无法解释的领域,伊凡们也就无法抛弃信仰、否定信仰的力量。所以,伊凡们将会在俄国的土壤上一直漂泊下去,如同不停地推着巨石上陡坡的西绪福斯。能拯救这类“多余人”,让其结束漂泊、回归根基的,似乎只有象征着东正教精神力量的俄国普通人和与他们紧密相连的弟弟阿廖沙了。反向观之,与犹豫和彷徨的伊凡相比,伊凡思想直接催生的怪胎斯梅尔加科夫就不存在这种纠结不已的思想痛苦,因为他对俄国根本不喜歡,他更像是欧洲的欧洲人,或者说是比欧洲人还欧洲的俄国人。

三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这些危害程度不等的“多余人”形象,有的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寄托的希望,有的则表达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愤恨与谴责。对于那些有希望回归俄国根基的西方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允许他们有过错和迷误,最终安排他们去忏悔;对于那些执着于西方思想而不思悔改的,就让他们英年早逝或慢慢泯灭。陀思妥耶夫斯基让索尼娅这样一个虔诚的教徒去感化拉斯柯尔尼科夫那颗浸透了理性毒液的心,督促他向俄国的大地母亲忏悔,到熙来攘往的闹市区公开忏悔,就是对他内心的复活充满期待。他让伊波利特在少年时夭折,说明了对这类真正的“多余人”已经不抱希望。他不但希望维尔希洛夫在俄国的历史舞台上消失,更希望他这样的“多余人”断子绝孙:

“读者头一眼就能看出他已经退出活动领域,而且确信他已经没地方可活动了。再往后去,就连这种厌世的子孙也不见了,又出现了我们还不知道的新人以及新的幻景。”(陀思妥耶夫斯基,1993:713)在这些西方主义者中,作者寄予最大希望的,应该就是斯塔夫罗金和伊凡·卡拉马佐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给卡特科夫的信中说:“在我看来,这(即斯塔夫罗金——引者注)是一个典型的俄国人。如果我没有把他塑造成功,那么我将会非常非常郁闷。如果我听到这样的判决,说他是矫揉造作的,那我将会更加郁闷。我是在发自内心地描绘他。”(Достоевский,1986:142)因而,作者也赋予了斯塔夫罗金最丰富的思想和最多的能力。“斯塔夫罗金本来是可以做一切事情的:他既可以成为伊凡王子,俄国弥赛亚主义的载体,也可以成为战胜死亡的人神,他还可以用美好的和神圣的爱去爱莉莎。”(Бердяев,1996:523)但是,斯塔夫罗金也最让人失望,他竟然把自己的精力耗费在情欲战争、奸淫幼女、咬长者的耳朵、决斗、与跛女人结婚等挑战世俗伦理的事情上。别尔嘉耶夫认为,斯塔夫罗金“这个具有创造性的、熟悉无数愿望的人,却注定创造不出任何东西来,注定不能简简单单地活着,为活着而生活”(同上:520)。别尔嘉耶夫以为他的死亡是他渴望无限性、放大个人主义而不知约束所导致的悲剧,而在我们看来,其实是斯塔夫罗金挑战伦理,进而也就等于挑战俄国人民和俄国东正教所造成的必然后果。

伊凡是在俄国国内水土不服的欧洲理性思想的象征,对这个形象,陀思妥耶夫斯基既爱又恨。爱的是他实验思想的勇气,正如布尔加科夫所说的,伊凡代表了一类俄国思想家的思考,因为这个形象考虑的是最具俄国特色的哲学问题:“在伊凡·卡拉马佐夫身上我们感觉到了自己熟悉的疾病,它构成了我们民族的特点,我们还感觉到了良心的疾病,并认为这是我们民族主要的心理特征。”(Булгаков,1993:43)因此,在布尔加科夫看来,伊凡又是备受怀疑考验的典型的俄国知识分子。“在这部长篇小说的全部典型人物当中,对我们俄罗斯的知识分子而言,这个形象是最接近、最亲切的;我们自己已经受着他那些痛苦,他那些问题也都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同时,这个人物形象使我们上升到这样一个惊人的高度,哲学思想只有在自己最勇敢者的身上才能上升到这个高度。”(同上:17)虽然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伊凡仍心存不满,担心伊凡所提出的那些与俄国情况格格不入的外来思想的腐蚀力,这种不满与对伊凡探索精神的赞许融合在一起。然而,推测其未得以展开描写的命运,伊凡不会像斯塔夫罗金那样走上一条自决于人民的宿命之路,他将在无神论和有神论之间作出最终的抉择。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尾声里,大哥米佳似乎已经预言

了二弟伊凡的命运选择：“你听着，伊凡弟弟会比我们大家都有出息。应该活下去的是他，而不是我们。他会痊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1981：1148）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来得及写作《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第二部就溘然长逝，因此，还很难说伊凡到底能不能摆脱“多余人”身份，但第一部已经将他成功地塑造成奥涅金之类的怀疑论者。

结语

除了上述这些作为典型的西方主义者的“多余人”形象，甚至可以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五大思想小说里的许多主人公，凡是经历过奥涅金这样的怀疑和彷徨的心理斗争的，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多余人”的特征；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他们都是“多余人”的徒子徒孙或者说大同小异的变体。正如俄国思想家费奥多尔·斯捷蓬所指出的：“男人们除了佐西马长老、见习修士阿廖沙·卡拉马佐夫和无性别的梅什金公爵外——更多地都是分裂的、精神上沮丧的人，他们都是从为他们指定的生活轨道上被赶出来的人。在他们中间有许多深刻的、重要的、聪明的人，但几乎没有顺从而智慧地扎根于上帝世界的人。俄罗斯文学里的所有‘多余人’，所有革命领袖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多数主人公，从拉斯柯尔尼科夫到斯塔夫罗金，都属于这类人。”（Степун, 1990：342~343）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这些人物形象都是时代的产儿，知识分子无法不带有那个时代的深刻烙印，亦即被以无神论为主的欧洲思潮吸引。这似乎是时代的通病，也是他们无法避免的宿命。就如丘尔卡图林在《多余人日记》中所说，他们只要活着就是“多余人”，而“在生命毁灭的同时，我不再是多余的了……”（屠格涅夫，1994：236）

鉴于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一代是接受外来思想的主体，陀思妥耶夫斯基严厉批判那些被异己思想所迷惑而在故乡漂泊、找不到立足之所的“多余人”知识分子，呼吁他们尽快结束漂泊，回归俄国人民的根基，从他们那里汲取艺术和人生的营养，并希望知识分子能胜任人民领路人的角色，最终带领全体人民将俄国文化和俄罗斯民族发扬光大，使之成为世界人民学习的榜样。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西方思想的实验品和牺牲品，像拉斯柯尔尼科夫和伊凡之类处于青壮年阶段的西方主义者，他们只是俄国思想群体的一小部分，属于在生活 and 思想困境中被迫和主动探索出路的平民知识分子和贵族知识分子典型，因此，他们的困惑、思索、选择和归宿，对于俄国知识分子更好地认清来自欧洲的异己思想的局限，重新重视俄国东正教文化的精神力量，具有重要的试错

价值和参考意义。他笔下这些作为西方主义者的“多余人”的作用，在一些正面形象，如《少年》中的阿尔卡季、《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阿廖沙和《赌徒》中的阿列克谢·伊凡诺维奇等出现时便尤为明显。这些正面形象犹如鲜活的镜子，生动地照出这些“多余人”的缺点。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类作为“多余人”的西方主义者形象的塑造和对其思想历程的刻画，体现出他本人对他们爱恨交加的复杂情感；亦爱亦恨表明他所持的是介于同时代斯拉夫派和西方派观点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即其根基主义立场。

参考文献：

- [1] Бердяев Н. А. Откровение о человеке в творчестве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А]. Вступ. ст. и сост. В. Н. Калюжного. *Смысл творчества: Опыт оправдания человека* [М]. Харьков: ФОЛИО; М.: АСТ, 2002.
- [2] Манн Ю. В. Лишний человек [А]. Под общ. ред. В. М. Кожевникова, П. А. Николаева.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 М.: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87.
- [3]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 М.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 т.19* [М]. Л.: Наука,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1979.
- [4] Бердяев Н. А. Ставрогин [А]. Составление, подготовка текста, послесловие, комментарии Л. И. Сараскиной. *«Бесы»: Антология русской критики*. [М]. М.: Согласие, 1996.
- [5] Мочульский К. В.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М]. Paris: YMCA Press, 1947.
- [6]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 М.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 т.29. к. 1.* [М]. Л.: Наука,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1986.
- [7] Булгаков С. Н. *Сочинения в 2 т., т. 2. Избранные статьи* [М]. М.: Наука, 1993.
- [8] Степун Ф. А. Мирозерцание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А]. Сост. В. М. Борисов, А. Б. Рогинский. *О Достоевском: Творчество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в русской мысли 1881-1931 годов.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С]. М.: Книга, 1990.
- [9] 格·弗里德连杰尔.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 [М]. 陆人豪译.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4.
- [10] 屠格涅夫. 屠格涅夫全集 (第5卷《中短篇小说》) [М]. 冯加等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4.
- [11] 陀思妥耶夫斯基. 卡拉马佐夫兄弟 (上下册) [М]. 耿济之译. 北京: 人民文学

出版社, 1981.

- [12] 陀思妥耶夫斯基. 罪与罚 [M]. 朱海观, 王汶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 [13] 陀思妥耶夫斯基. 少年 [M]. 文颖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 [14] 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第19卷《作家日记》(下)] [M]. 张羽等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9.

收稿日期: 2016-05-09

作者信息: 万海松,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100732, 研究方向: 俄罗斯文学与文化。
电子邮箱: wanhaisong@sina.com



本刊征订启事

本刊通过邮局及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海外)征订发行, 每期定价12元, 国内邮发代号: 80-630, 国外发行代号: M6997, 敬请广大订户与邮局、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联系订阅。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是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管,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主办, 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高校学报(双月刊)。

除传统语言学研究、翻译理论与实践、外国文学评论、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等固定栏目外, 学报还将根据各期的关注重点, 设立“名家论坛”“学术争鸣”“学术前沿”“博士新论”“重点项目追踪”“文化研究”“国别研究”“一带一路与国家语言战略研究”“典籍翻译与中国文化走出去”“书刊评介”等机动栏目。另外, 在传统栏目中会不定期举办反映各研究领域最新成果的专栏。

**The Descendants or Variants of “Superfluous Man”:
Dostoevsky’s Pochvennichestvo as Reflected in the Westernized Figures in
His Five Ideological Novels**

WAN Haisong

(The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 of CAS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the character type of “superfluous man” originates in A. Pushkin’s verse novel *Yevgeniy Onegin*. The westernized figures in F. Dostoevsky’s five key ideological novels, such as Raskolnikov in *Crime and Punishment*, Ippolit in *The Idiot*, Stavrogin in *The Demons*, Versilov in *The Youth* and Ivan Karamazov in *The Brothers Karamazov*, can be regarded as descendants or variants of “superfluous man”. This kind of “superfluous man” appears in Dostoevsky’s novels mainly as the radical westernizers. They inherit their spiritual father—Onegin’s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longing for truth and action at first, falling into confusion and existential boredom without a way out in the prime of life, and even jeopardizing the native people and homeland in the end. Besides these exterior features, Dostoevsky also reveals the immanent cause of their spiritual commonness. In Dostoevsky’s view, the father-and-sons of “superfluous man” as the elites of Russian intelligentsia are attracted by European civilizations and entirely enticed by the western rationalism, which are quite alien to traditional Russian culture, especially to the Russian Orthodoxy. Trusting in those foreign ideas leads to the radical westernizers’ alienation from the native people and traditions. They become spiritual wanderers in their hometown and even do harm to the cultural traditions of Russia. Dostoevsky’s idea of *pochvennichestvo* is clearly reflected in his complicated feelings of love and hate towards these westernizers as “superfluous man” in his five ideological novels.

Keywords: Dostoevsky; five ideological novels; westernizers as “superfluous man”; *pochvennichestvo*